

2025 年第 3 期（总第 82 期）



学 2025 科 动态



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

目 录

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编 2025 年第 3 期（总第 82 期）

政策解读

把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专家视角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财经类高校学科治理机理、逻辑与路径 11

观点追踪

人文经济学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的挑战与机遇 26

学界动态

数智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29

导 读

党的二十大首次把“高质量发展”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头号任务，并给出“建设教育强国”“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路线图。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再次明确：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高质量发展当作生命线，教育强国的最终指向是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赋能。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三项改革必须一盘棋推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由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共同牵引。在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财经类高校如何以高水平的学科治理推动自身跃升，再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反哺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双一流”建设必须回答的时代考题。本期《学科动态》选编了教育部部长怀进鹏的报告、学界部分专家的观点及动态，供读者参考。

第一小节“政策解读”摘编了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把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第二小节“专家视角”选编了《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财经类高校学科治理：机理、逻辑与路径》一文，文章就财经类高校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学科治理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探讨。

第三小节“观点追踪”部分，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结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问题。

第四小节“学界动态”部分，介绍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第二届会议的情况及部分专家的观点。

把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024年9月，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系统部署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行动纲领和科学指南。今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系统部署。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面落实《纲要》各项任务举措，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一、充分认识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教育作出战略部署，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愈益凸显。要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把准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关系坐标，清醒看到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深刻认识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意义，清晰把握时代责任和努力方向。

建设教育强国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要求。我国在校学生2.9亿，约占总人口的21%，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当前，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和挑战。必须立足两个大局，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确保培养的人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

建设教育强国是应对世界百年变局、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赢得战略主动的重大抉择。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教育在加快前沿新兴领域人才储备，推动新技术加速迭代和融合应用中的关键性作用越来越凸显。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和战略支撑，将为国家核心竞争力注入可持续动能，为国家赢得未来战略主动提供有力保障。

建设教育强国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发展条件和增长模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教育是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先导，这就要求高校发挥高水平人才培养主阵地、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成为战略引领力量，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更多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并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加有力地支撑高质量发展。

建设教育强国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以来，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领域“量”的短板已经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质”的需求更加凸显，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加公平更加多样的教育充满期待。同时，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新的趋势性特征，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区域增减分化，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性、科学性、动态性提出更高要求。建设教育强国，迫切需要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受教育机会，不断增强

教育获得感。

二、牢牢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总体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鲜明提出教育的“三大属性”，精辟概括教育强国“六大特质”、“八大体系”的基本特征，深刻阐述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整体擘画出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图景。

“三大属性”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根基和原点。“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是总书记关于教育本质特征的重大理论创新。政治属性回答了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体现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人民属性回答了教育的基本立场问题，体现我国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聚焦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战略属性回答了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体现教育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三大属性”内涵丰富、相互联系，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鲜明特色和独有优势，要求我们体现到教育强国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六大特质”是检验教育强国建设成效的根本性标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教育强国之“强”，应当以强大的思政引领力确保人才培养方向，彰显社会主义教育本质特征；以强大的人才竞争力助力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以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战略人才高水平自主培养；

以强大的科技支撑力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以强大的民生保障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以强大的社会协同力汇聚教育发展合力，协调整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以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更好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六大特质”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本质性要求、标志性成效和根本性标尺。

“八大体系”是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四梁八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八大体系”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各级各类教育，加强科技支撑，把握教师队伍建设基础作用，拓展教育国际化发展空间，构成相互联系和支撑的逻辑体系，推动教育体系更加注重系统性、综合性集成，推动教育组织更加注重开放融合、多元多样，推动教育发展更加注重胸怀天下、自信自立，推动教育活动向更加灵活广阔的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延伸。

“五个重大关系”是教育强国建设应当遵循的科学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为我们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明确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重点和最终目标，需要聚焦教育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领域、把握好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新特征，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助力国家富强和促进民生幸福的统一。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揭示出掌握学业知识是学生能力提升的主要途径，全面发

展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内在要求、是培养造就栋梁之才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需要从更多关注学生的知识增长向“五育并举”转变。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揭示出供需适配才能彰显人才培养效用、实现人才价值，需要一体统筹解决人才培养供需矛盾，不断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配性和有效性。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揭示出管理规范、秩序井然是有效教育教学的重要前提，精进不怠、活力迸发是学校应有状态，需要解决好教育秩序维系和前进动力机制的问题，有效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彰显教育发展的道路自信、展示教育发展的宽广视野，需要解决好教育自信自立和胸怀天下、博采众长相统筹的问题，把握世界教育强国的共性特征和规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三、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任务作出全面系统部署。我们要坚持实干为先，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各项目标任务落到行动、见到实效。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三进”，落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为载体和抓手，推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实践育人大课堂有机结合，塑造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育人新格局。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制定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体现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高质量开好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拓展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推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深入实施重大专项，深刻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编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领域专题

讲义，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应的学科方向和课程教材。实施“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建设行动，编写出版一批优质教材。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持续推进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健全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工作体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劳动习惯养成计划、美育浸润行动、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让学生更加健康、阳光、自信地成长。

锚定国家重大战略急需，深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遵循教育强国是教育整体实力强和服务现代化建设支撑力、引领力强的双重逻辑，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根据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构建差异化评价体系，完善资源配置和制度保障。在中西部和东北等地推进高等研究院建设，把高校优势学科建设与区域发展重点特色相结合，开辟振兴区域发展新赛道。聚焦质量、特色和贡献，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双一流”标准研制。加快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突出分类施策，对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短期需求激增的学科专业重点提升快速响应能力，对于面向科技前沿和未来产业、需求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学科专业适度超前布局，对于人才需求相对稳定的学科专业注重更新内涵、提高质量。建好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完善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机制。积极探索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制度机制，深入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以重大任务为牵引，促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再创新。推进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打造“中心+节点”的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网络体系。围绕国家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把优秀人才放在真实一线场景、解决企业问题实战中，实现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相融合。拓展实施基础学科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101计划”），

建设核心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践能力项目平台。对高校青年科技人才实施长周期评价、给予高强度支持，引导开展原创性、非共识创新研究，培养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坚力量。着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围绕经济要素聚集区、产业发展功能区需求，围绕先进制造业等重点产业链，推进职业教育与地方、行业融合试点和职普融通试点。推进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深化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积极应对人口峰谷变化带来的挑战，把资源调配机制作为战略抓手，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加强学龄人口预测和学位需求预警研究，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科学规划布局城乡学校。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提升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办学质量。推进县域高中振兴计划，有序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提振县中发展信心。稳步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推动随迁子女“同城同待遇”，健全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关爱体系和工作机制，保障好特殊群体受教育权益。以“双减”撬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提升校内教育质量和校外治理水平，健全减负提质长效机制，探索设立一批以科学教育为特色的普通高中，办好综合高中，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加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加快推进校家社“教联体”建设。

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根基。围绕构建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坚持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与提高教师素质有机结合，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培养培训、管理评价、荣誉激励全链条。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对师德违规、学术不端“零容忍”，强化底线

管控。健全教师教育培养培训体系，推动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培养高层次、复合型教师。进一步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整体推进师范专业、学科、课程、模式改革。深入实施“优师计划”、“国优计划”、“国培计划”，健全教师全员培训体系。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健全教师减负长效机制。厚植尊师重教文化，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加大优秀教师宣传选树和表彰力度，吸引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着眼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促进更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以系统观念构建教育大外事工作格局。促进中外师生往来和人才交流，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弘扬留学报国光荣传统，让更多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报效祖国。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提升高等教育海外办学能力，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国际合作机制。深化国际教育科研合作，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建设大科学装置、主持重大国际科研项目，推动建设高水平高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积极参与开放科学国际合作。深化同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合作，参与全球教育议程设计、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建立教育创新合作网络，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建设学习型社会。抢抓数智化发展机遇，释放数字技术对教育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溢出效应，加快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平台提质升级，做到高水平集成和优质资源共享，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持续打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等公共产品，

擦亮数字教育中国品牌。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推动以智助学、以智助教、以智助管、以智助研，探索未来教育新形态。加强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完善人工智能算法和伦理安全相关制度，引导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打造终身学习的数字基座，完善终身学习制度，开展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建设，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继续教育、开放教育和老年教育体系。

——摘自《求是》2025年6月1日第11期

怀进鹏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财经类高校学科治理： 机理、逻辑与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提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具体要求。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就建设教育强国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学科治理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成为财经类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新命题。

一、从学科建设到学科治理的内在机理

学科是大学发展的基础单元，在大学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引领性作用，其发展水平是大学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更是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尤其是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以来，学科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然而，随着“双一流”建设的纵深推进，以及学术话语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对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日益提升，高校迫切需要创新学科管理模式，提升学科治理水平。作为学科建设的龙头和抓手，学科治理更注

重知识理性、主体多元、协同共治，是当前高校提升学科管理水平、促进学科建设、优化学科生态的重要手段。学科治理命题的提出，既是社会发展、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外部客观要求，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迫切需求

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探索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为专门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各类人才，许多地方纷纷办起大学，高校数量迅速增加。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逐步形成了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改革思路，即通过控制高校数量、扩大学生规模，使现有学校达到合理的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高校数量虽然保持基本稳定，但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资源非常匮乏，内涵式发展的思路已无法满足高等教育发展需求。进入 21 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思路开始从内涵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高校数量迅速扩大，学生规模急剧增长，我国快速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内涵式发展再次受到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注重教育内涵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三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目标实现了从提高办学效益到稳定高等教育发展，再到优化整体办学结构、提高办学质量的转变，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不仅要关注自身发展，还需考虑如何支撑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以助推教育强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具体要求，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引领高等教育

发展的时代主题。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高等财经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更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与内涵式发展阶段要求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成长与整体发展,关注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的协调程度,关注高等教育的贡献率、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高校学科治理作为一种将学科置于学术治理场域中,通过探寻学科治理思维 and 不同利益主体间关系,从而促进学科发展的决策及实践活动,更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二)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作为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治理与国家治理具有同构性,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仅是高等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推进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系统观念,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学科是大学存在与发展的内生性源泉,一流大学治理的根基还在于一流的学科治理。随着学科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如何遵循学科发展规律,科学处理好学科建设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学科治理,提升学科决策能力,成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学科治理不仅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内在旨意，也是大学内部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三）学科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目标，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财经学科发展也面临着新任务、新挑战。国内形势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建设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国际形势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加强，同时后疫情时代国际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针对国际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发出中国声音，贡献解决全球共同经济问题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亦是新时代高等财经学科肩负的重要使命。

在新的历史起点下，财经学科需根植中国实践，以国家现实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不断加强咨政建言、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支撑。学科治理作为应时代变革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民主合意、共同商定的善治过程，能够将公共理性贯穿于学科建设过程中，更好地回应公共利益、解决社会重大现实需要，进而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 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伯顿·克拉克指出,“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自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处理各门高深知识就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并一直是各国高等教育的共同领域”。这一门门知识就构成了“学科”。从学科内涵本身来看,其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作为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因此,学科其实是内部知识形态和外部组织形态的结合体,学科发展则表现为学科知识和学科组织的互动互促。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回应政府、社会、市场等外部组织的要求,还需更多地遵循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体现知识体系作为学科的内在本质追求,将知识逻辑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遵循和合法性基础。相比传统的具有较强行政规划色彩的学科建设,学科治理更加重视学科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学科的知识性和专业性,并通过捍卫学科自主权和治理权,有效保障本学科的价值和利益诉求,使学科发展方向同国家、社会、高校的整体价值追求保持一致。

二、高校学科治理的价值逻辑

每种独特的价值逻辑都为特定的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了一套连贯的组织原则,而逻辑多样性则使组织更持久、更具可持续性和创新性。如前所述,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发现、传授与应用知识的重要使命,大学学科治理则主要指政府、高校、学者等学科利益主体通过对学科发展的重大事务进行决策和管理,实现学科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具有知识性、组织性和实践性三重特性,相应地也就具有了学科层面的知识生产逻辑、高校层面的组织行为逻辑以及国家层面的社会需求逻辑。(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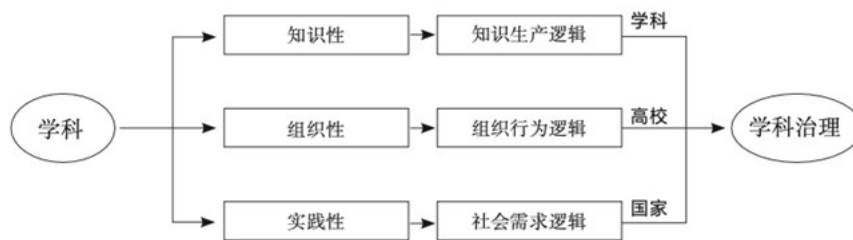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学科治理的价值逻辑

（一）学科层面的知识生产逻辑

知识是通过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每一学科其实都是知识发展的历史产物，都有相应的知识传统和行为准则，学科分类的产生最初就是为了知识的保存、使用、发展与传播，具有系统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发现的功能和价值。在知识生产逻辑下，学科治理的目标在于：一方面，通过处理好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遵循学科发展规律，保存已有的学科实践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创造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提升学科的学术声誉，使学科依据一定的逻辑结构发展新知识，最终实现学科知识的创新与增长。

对于财经类高校而言，面对新变化、新挑战、新要求及新机遇，财经学科的知识生产活动需更契合现代知识发展的基本逻辑。在这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风貌和文明程度。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对回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财经学科治理的目标在于重点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鼓励跨学科研究，推动科学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社会发展需求、产业转型需求紧密对接，力争产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学路径，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建设，为建

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贡献。

(二) 高校层面的组织行为逻辑

除知识的维度外,学科还有从事具体学科知识生产的组织维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学科组织对学科政策的有效实施,而学科组织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学科多元权力主体的参与和协作。因此,学科组织的运行不仅需要优化配置学科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多种要素,还需处理好学科内外部主体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在组织行为逻辑下,学科治理的目标在于从治理协同视角优化设计学科组织及学科制度,营造良性互动的学科治理秩序和环境,从而凝聚学科共识,形成建设合力,最终实现学科的善治目标。

在财经类高校中,多学院共建一个一级学科尤其是优势学科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鼓励各学院发挥优势,形成学科规模效应,但同时也容易出现建设学院各自为政、学科共识难以形成、学科方向难以凝练、学科建设资源无法有效整合、学科容量较小、学科交叉融合难度较大等问题。为此,高校需在遵循财经学科发展的规律基础上,通过积极有效的学科治理,构建学校、学院、学科良性互动机制,在凝练学科发展特色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学科结构,实现学科集群发展效应,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 国家层面的社会需求逻辑

社会需求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学科只有面向和回应社会需求,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同时,高校作为资源依赖型组织,深受外界力量的影响,需与政府、社会、市场等建立多元合作关系,在履行服务社会职能的同时,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谋发展,从而获得充足的办学资源。在社会需求逻辑下,学科治理的目标在于主动适应时代特征、面向国家需求,吸纳政府、社会、市场等主体参与学科建设,通过优化学科专业布局、规划学科发展方向、

凝练学科发展特色，实现学科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无缝对接。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学科既要扎实开展科学研究，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将研究成果融入国家发展，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下，财经学科需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聚焦新发展阶段重大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开展政策研究，提出高水平的解决方案，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

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财经类高校学科治理的路径选择

学科治理涉及学科自身层面的知识生产逻辑、高校层面的组织行为逻辑以及国家层面的社会需求逻辑，是一个由多项要素和环节构成的系统工程，需结合财经类高校特点和学科建设规律，以学科治理相关利益主体的价值为导向，思考和规划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推进路径，形成学科建设的合力。

（一）学科治理遵循的基本原则

1. 坚持治理理念的开放化

当前，高校学科治理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高校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学科的持续发展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撑；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生产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型，高校传统的学科建设范式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高校学科治理需构建开放共治的治理理念，除内部的知识生产创新外，还需打破传统学科建设路径，结合社会发展需求，引入社会、市场力量，形成政府、高校、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应用性较强的行业特色高校学科来说，更需树立开放化和多元化的学科治理理念，推动学科内部知识

生产与外部市场、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

2. 坚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在开放性的现代学科治理过程中，单纯依靠高校或学者力量进行学科建设难以推动学科发展。高校学科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各利益主体为实现各自需求而进行价值选择与博弈的过程，也是学科共同体认知和价值取向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科治理需充分考虑政府、社会、市场、高校、学者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通过构建开放多元、民主协商的治理机制，畅通各利益主体价值诉求和参与治理的对话渠道，在达成学科发展共识、提升学科凝聚力的基础上，促进多元主体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发挥各自作用，从而保障学科治理的有效性。由此，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不仅是学科治理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也是学科治理区别于传统学科建设的重要特征。

3. 坚持治理方式的互动化

学科是知识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结合体，学科治理在本质上体现为学科知识与学科组织的“两态”互动，兼具学术治理和行政治理的双重特征，二者互动共融，在实现内外部平衡中促进学科发展。同时，在学科、高校、国家的三重价值逻辑下，学科治理更加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同，其权力向度是多元、发散、互动的。一方面，为保障学者在学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需要自下而上配置好学术权力以夯实学科治理的知识根基；另一方面，为充分发挥大学组织在学科治理过程中的推动作用，还需自上而下地运用好行政权力以确立学科治理的组织基础。只有在突出学科本位的基础上，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互动，使学术治理与行政治理保持一定的张力，才能畅通学科对话渠道，保证良好的学科治理成效。

4. 坚持治理目标的善治化

作为一种复杂的公共生态系统，治理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公共价值导向提高对治理主体的认知水平和治理水平，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共责任和共同意志，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学科治理旨在追求学科的“善治”，即在遵循学科内在发展逻辑和学科自身价值追求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合作协商的治理机制，协调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激发学科共同体成员的内生动力，形成良好的学科自治秩序。具体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聚焦学科共同体的学术自由，坚守学术自治理念，通过学科善治形成学科自治的独立话语体系；二是聚焦学科组织的规范性价值，营造包容开放的学科文化，通过学科善治激发学科组织的活力和创造力；三是聚焦学科发展的公共意志，回应国家需求，通过学科善治增强学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财经学科治理的关键路径

在学科治理中，学科、高校、政府构成了学科三大治理主体，分别代表学术力量、行政力量、国家力量，通过良性互动、协同支持，形成学科发展共同体，在遵循各自价值逻辑的同时将学科发展引向善治之道。（详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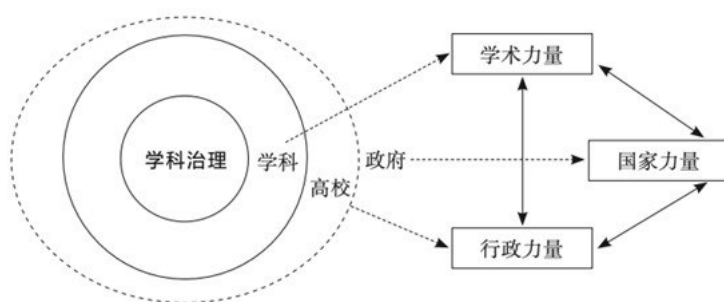


图2 学科治理的三种路径及互动机制

1. 尊重学科微观层面的知识特性，强化学术权力的主导作用

学科是知识生产的重要载体，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自组织性，客观要求

学科必须掌握自身的自主权，这是学科共同体形成的基本前提。这种自主权便是学术权力，即学科的专家学者依据其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对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施加影响和干预的力量。在学科治理过程中，要实现学科的善治目标，必须遵循知识生产逻辑，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学术权力在学科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确保学者在学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学者是学科治理的关键主体，为充分发挥学科共同体对学科治理的引导作用，捍卫学者在学科治理中的决策权与话语权，高校应在学校章程中强调教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为教师开展教学、科研等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和保障，同时在学科治理中注重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学术骨干的遴选、学科团队的组建等，发挥教师在学校教育教学、学术事务中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要确保学术力量在学科治理中的权力。在学科发展规划编制、学科方向凝练、学科布局优化、学术标准制定、学科成果评定、学科人才引进、学科资源分配等治理事务中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力量的决策作用，积极听取学术团体的意见，加强学科自治能力建设。

当前，各高校踊跃尝试的学部制改革无疑是强化学术权力、推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更加合理分工、构建和完善高校学科治理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作为超越学院层次、统筹相近学科或者某一学科的一种开放性学术共同体，学部突破了单一学科的视野局限，打破了学院、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得学科具有较大的集成度、开放性和灵活性。同时，通过凝聚学科发展共识，将学院、学科之间的关系从“竞争共生”转变为“协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协同运行，解决了很多财经类高校中一级学科建设多个学院各自为政、整体感和责任感不强的问题，拓展了学科的知识生产领域，提高了学科治理效能。（详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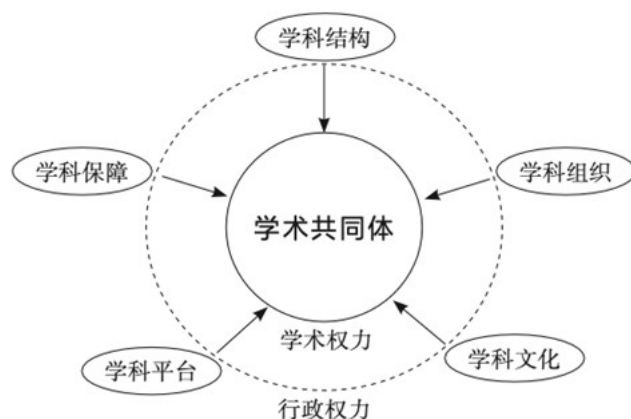


图3 行政权力在学科治理中的服务路径

2. 尊重学科中观层面的组织特性，发挥行政权力的支撑作用

学科治理固然不能虚化处于核心地位的学术权力，但也不能一味放任学术权力，采取绝对化的学科中心主义，这不符合学科的组织特性，也不利于学科发展效率的提高。作为一种执行权力，行政权力诞生之初主要为了减轻学术人员的事务性工作负担，在遵循学科运行机制和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创造互促共进的学科发展环境，整合同类学科资源，帮助学术人员潜心于教学科研工作，服务于学科知识生产，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要实现学科的善治，还需结合学科的知识与组织双重属性，明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发挥好行政权力在学科治理中的服务和保障作用，推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有机耦合，激发学科发展动力和活力。具体来说有以下五点。

一是要优化学科发展结构。在遵循学科知识生产逻辑的基础上，以国家重大经济战略需求为导向，对学科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推进学科间、学科组织间交叉互动，培育与整合新兴学科，不断优化财经学科体系，提高中国特色财经学科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指导性与贡献度。如中央财经大学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快速响应中央“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攻坚战”战略，推动跨学科多学院聚集建设合力，形成金融安全新兴交叉学科，开展金融安全的工程化研究，团队已形成集“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为一体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服务金融强国建设。

二是要健全学科发展组织。学科组织既是学科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又是学科治理的必要条件。在学科治理中，学者们的专业话语权只有在学科组织中才能实现有效凝聚与整合，最终转化成特定的学科决策安排，从而强化学科成员的身份认同，保障学术权力作用的正常发挥。如中央财经大学在成立“双一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时，还下设经济学学科群建设委员会，既充分发挥了学术权力在学科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也为学科治理的实施奠定了必要的组织基础。

三是要夯实学科发展保障。学科的组织特性客观决定了学科治理不仅需要以知识生产创新为驱动，还需要一定的规则体系来进行规范和保障。适度的学科服务制度、协同创新制度、绩效评价体制、资源配置机制等规范体系有利于学科治理中权力、权利、职责、程序以及监督和问责机制的规范，进而巩固学科治理合法性基础，保护学科治理成果，保障学科治理体系的高效运行。如中央财经大学在学科建设中形成稳定发展的基础性经费、择优支持的竞争性经费和鼓励争先的奖励性经费的“三位一体”学科建设经费长效支持机制，进一步激发学科建设单位内生动力，促进学科有特色、高质量发展，鼓励各学科在不同领域争创一流。

四是要创新学科发展平台。学科平台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设备保障及交流共享载体，是促进学科交叉及连接学科内外要素的重要硬件条件，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面改写传统财经学科发展的版图，财经学科也在不断搭建新平台、

开辟新赛道以迎接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挑战。如中央财经大学建设国家金融安全与大数据实验室、金融安全工程与监管科技实验室、金融人工智能实验室、大数据与系统决策实验室、经济对抗与经济战争模拟仿真实验中心、保险与风险管理国际联合创新实验中心等文科实验室，探索财经学科前沿和边界，做好财经学科与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等学科的深度融合，为财经学科注入新的活力。

五是培育学科发展文化。学科文化是学科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特有精神品质和价值标准，主要通过培养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科认知理念和学术信仰，使多元治理主体达成学科治理共识，对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是学科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学科治理过程中，高校应重点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内部以及学科之间的对话协商，打造和谐包容的学科治理生态，为学科知识生产和学科自治创造良好氛围。如中央财经大学建设了一批新兴交叉学科建设项目，建立开放性的项目沟通协调机制，搭建项目团队之间、项目团队与校内外科研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平台，已产生了行为经济、数字财税、智能财务等学科方向。

3. 尊重学科宏观层面的实践特性，突出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建成教育强国作为 2035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并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一体推进，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系统的部署，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新发展阶段，学科治理不仅仅是学科共同体发挥学术权力、进行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也不仅仅是高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实施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

财经类高校作为行业特色高校，其学科发展更应注重应用型和实践性，聚焦国家战略需要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传统特色优势学科基础上积

极拓展新学科，寻求学科发展内外逻辑的交汇点，提升学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当前，面对新科技革命给财经学科带来的新变化、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给财经学科带来的新挑战、全球经济深刻变化给财经学科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财经学科带来的新机遇，财经类高校应坚持“四个面向”，主动融入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大局，针对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科研创新，及时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打造有利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平台，积极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建构独具特色的财经学科体系，打造财经特色新型智库，形成财经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效供给、精准供给、创新供给的良好格局。

——摘自《新文科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

马海涛

人文经济学的未来： 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结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何在，已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是驱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柱。

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始终是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支柱，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力的普及，再到信息技术的突破，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在塑造价值观、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重塑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方式。其广泛应用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给生产关系带来诸多挑战。因此，必须以人文精神为导向，为人工智能注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使其成为“有温度”的技术，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真正惠及全社会。

人文经济学的使命，在于为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注入人文关怀。

经济学向来有关注社会公平与人类福祉的理论传统。阿马蒂亚·森等学者在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领域提出一系列理论，强调经济学不仅要关

注经济增长，更应致力于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社会机会的拓展。贫困经济学、不平等经济学等新近研究，也聚焦于如何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此外，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研究均强调，经济政策应以增进全社会福祉为目标，尤其是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条件。例如，人类发展指数不仅关注经济增长，还将教育、健康等社会因素纳入衡量标准。这些都体现了经济学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故而，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使命在于，为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注入人文关怀，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既研究资源配置，又能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学科。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拓宽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与应用边界。

长期以来，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社会规范、社会资本等人文因素，在经济决策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数据测度困难，传统研究往往局限于定性分析，难以形成系统化的实证研究范式。大数据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传统界限，给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带来了深刻变革，极大地拓展了其理论视野与应用边界。

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人文经济学研究者能够更精准地衡量和分析人文因素，促使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朝着现代化、数据驱动化方向演进。例如，语言作为人类最核心的交流媒介，人类每时每刻都在生成海量文本数据，这些数据蕴含着经济主体对政策变化、市场波动、外部冲击的心理预期及情绪反应等丰富信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大语言模型，研究者可以从文本数据中提取情感倾向、心理预期、社会情绪等信息，进而将原本难以度量的社会心理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框架。此外，诚信体系、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社会伦理、社会文化等传统上较难量化的社会关系变量，如今也可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进行测度和建模，进一步深化对经济主体市场行为及其社会互动模式的理解。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提升了人文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还在突破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为跨学科融合提供了新契机。例如，社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关注个人经济活动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环境、社会与治理已成为社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又如，社会金融学强调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理解金融市场的演变过程，研究金融特征的文化变迁、信息传播偏差及其对市场动态的影响。这一新理论范式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迈入新的阶段，也进一步印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拓展人文经济学学科边界、创新研究范式方面的重要作用。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文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一定冲击，但这一冲击中也蕴含着重要机遇。尤其是海量文本数据的积累和挖掘，为人文经济学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面对这一变革，迫切需要依托人工智能驱动的研究方法与工具，深入挖掘经济社会大数据这一蕴含丰富人文信息的“富矿”。人工智能的崛起并不会削弱人文经济学的学术价值，相反，只要以积极开放的姿态拥抱这一技术变革，人文经济学研究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能让人文经济学研究变得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从而更精准地分析和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与挑战，促进技术进步与社会公平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繁荣。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25年4月

洪永淼、史九领

观点追踪

数智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第二届会议

5月14日至15日，武汉大学举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第二届会议。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黄学龙、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协理副校长 Li Li 等出席大会并致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合肥工业大学杨善林院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付子堂，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以及来自30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专家学者和科研管理部门同仁共200余人参加会议。武汉大学副校长陆伟主持大会。

张平文致辞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九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本次会议聚焦“数智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讨如何有效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方面的能力，致力于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他对实验室联盟的建设发展提出三点期望：一是推动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构建资源共享体系；二是培育交叉人才，加强合作交流；三是深化成果应用与社会服务赋能，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转化平台。武汉大学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与各成员单位携手，共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在数智时代实现新跨越，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贡献武大力量。

黄学龙表示，实验室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平台和基地，也是完善

体制机制创新环境的关键载体，数字化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需结合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他分享了湖北省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指示方面的具体经验，重点介绍了长江文明研究领域的创新探索。

姜国华总结了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过去一年的基本工作，并以“共有、共建、共享、开放”八个字概括了实验室联盟未来的发展思路。他指出，文科实验室建设要具备回馈时代需求的使命担当，要坚持以加强协同合作为发展路径，要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积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Li Li 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与信息管理学院在人才培育方面的突出成绩，表示埃克塞特大学愿与中国高校加强合作，推动中英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交流合作迈向新高度。

主旨发言环节，托马斯·萨金特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作题为“Open source computing and learning”的报告；杨善林就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发展展开探讨；付子堂分享了加强人工智能法学教育，推动法学教育创新的认识与思考；马费成作题为“数智赋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经验分享。成果发布环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主任王晓光教授介绍并发布文化遗产 3D 数据空间的相关成果。

大会还设置了五个平行论坛，分别围绕“数字人文与人类文明传承”“数智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数智公共治理与可持续性发展”“数智赋能与全面依法治国”和“数智驱动与未来文科发展”主题，展开主题报告和专题讨论。会议期间召开了实验室联盟工作会议。

在“数智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平行论坛上，相关参会高校做了分享。

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副主任秦海英教授在报告中系统介绍了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建设进展与标志性成果，重点阐述了实验与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等六个研究方向。

南京大学数据智能与交叉创新实验室主任孙建军教授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数智融合推动文科实验室创新发展的建设成效，重点涵盖基础设施、数智平台以及智库服务等多元化成果。

天津大学复杂管理系统实验室执行主任马寿峰教授在报告中以建设高质量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为核心，提出研究范式突破、学科深度交叉、社会价值彰显三大维度，并阐释了跨学科发展路径及近三年实践成果。

中山大学大数据管理行为与决策实验室管理学院学术主任韦立坚教授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构建数智技术中台推动管理学创新的路径，重点展示实验室通过产学研数据整合、隐私计算技术、超算资源支持等核心特色，并应用于金融、旅游、医疗等多元场景的实践成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思言教授在报告中聚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的跨学科与国际合作特色，强调其全国首个全球价值链专业通过法学、工商管理 etc 学科交叉及国际化团队构建，并重点展示实验室自主开发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和权威全球价值链产业报告两大成果。

上半场报告环节结束后，浙江大学数智创新与管理实验室主任谢小云教授做出了专家点评。他从五位报告者的分享中提炼出了五点共性内容供大家参考——第一是学科交叉，尽管工科院校和文科院校交叉的领域方向不同，但都以问题为导向进行交叉研究，不会限制在单一学科领域；第二是需求牵引，如服务于宏观经济决策咨询；第三是科教协同，实验室要发挥人才培养的价值；第四是开放共享，如技术中台、数据平台共享，课题开放等；第五是价值取向，文科实验室在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寻求平衡、追求价值理性，

与理科实验室的工具理性相区别。

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陈滔教授系统阐述了金融安全与行为大数据实验室的学科布局及以重大项目驱动成果转化的建设路径，并抛出跨学科团队融合、平台吸引力提升及研究机构定位差异三大管理命题供学界探讨。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字经济监测预测预警与政策仿真实验室副主任周光辉教授在报告中系统阐述国科大新文科实验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重点展示其学术成果及学术活动对经济与管理学科发展的多维支撑。

武汉大学智慧决策与创新空间实验室主任黄敏学作《智慧决策与创新空间实验室建设》报告，介绍实验室设立背景、定位、布局、思路及典型案例，强调其为社科研究、理工科应用提供支撑，以数智驱动推动社科升级，采用五位一体布局及持续迭代思路，并以全国营商环境可视化分析展示建设成果。

下半场报告环节结束后，南京大学人文社科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孙建军做出了专家点评。他从报告中提炼出了四点共性——第一，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文科实验室在系统地推动人文社科研究范式的升级、提升高水平的科研等方面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第二，学科交叉融合明显，文科实验室在打破知识系统的边界，推动跨学科交流方面做了良好的示范；第三，数据和智能元素突出，长期跟踪研究可使数据发挥较好作用；第四，实验室开放，全国人文社科实验室开放问题值得讨论，需要进一步探讨人文社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摘自“武大社科动态”公众号

文中转载文章版权归属原作者，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 121 号，邮编：100070

官网：fzghc.cueb.edu.cn

E-mail: guihua@cueb.edu.cn